

## 膠州灣事件後中日關係的轉變： 兼論日本對華外交的多元性\*

吉辰 \*\*

膠州灣事件發生後，日本外務省制定的外交對策是勸說清政府對德妥協，十分保守；實際操作中，駐華公使矢野文雄也表現平平。而代理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借此機會，促使上海道蔡鈞向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出中英日同盟的建議。一名英國海軍軍官此時亦提出此議。同時，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先後派遣軍官神尾光臣、宇都宮太郎來華遊說。在種種合力作用下，劉坤一向總理衙門提議聯盟英日，而張之洞率先將此議上奏。儘管中樞對此不表贊同，但親日的種子已在一些清朝官員心中種下，對此後中日關係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於英國此時並沒有對華結好的計畫，聯英主張很快消失。這種派遣中下級軍官遊說清朝封疆大吏的模式，亦曾在福建、四川、直隸、奉天等地展開。日本對華外交在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不是外務省與駐華公使，而是理論上沒有外交權責的駐上海總領事館與參謀本部，體現了日本對華外交主體多元性的特點。

關鍵詞：膠州灣事件、中日關係、日本對華外交、張之洞

---

\*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20wkpy35)資助，承蒙兩位匿名審稿人精心審閱全稿並惠賜寶貴意見，謹表謝忱。

\*\*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助理教授。

## 一、前言

1897 年底至次年初，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節點。幾年前兵戎相見的兩國，此時急速拉近了距離。日本向中國拋出了橄欖枝，而若干清朝高官開始主張聯日，士大夫中間也有了親日的氣氛。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 R. Reynolds)先生對此有一段簡明的概括。在回顧了三國干涉、中俄密約對日本的刺激，以及甲午戰後中國變法自強的思潮後，他如此寫道：「在這歷史背景下，1897 年末至 1898 年初，中日兩國在各自單獨的發展中，突然產生了共同感覺到的需求：在中國，以複雜的心情謀求在日本幫助下，進行現代化改革，特別是加強軍力；而日本則甚而更為迫切，謀求在中國幫助下，阻止俄國和其他西方列強可怕的推進。」<sup>1</sup>

那麼，兩國為何在這個時候接近，具體又是如何接近的？學界對此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任達先生將其時日本對華遊說的行動歸納為「兩面開弓」(軍事與非軍事)的戰略，並根據隨後中日兩國在各方面發生的緊密聯繫，將 1898 年看做是近代中日關係「黃金十年」的起始。<sup>2</sup>廖隆幹、茅海建、鄭匡民諸先生探討了稍後戊戌變法期間日本政府的對華策略，指出大隈內閣與山縣內閣的策略有所不同。<sup>3</sup>伊原澤周、陶德民、李廷江、孔祥吉、村田雄二郎諸先生側重清朝重臣張之洞(1837-1909)發揮的作用，<sup>4</sup>桑兵、邱濤、鄭匡民、

<sup>1</sup> 任達著，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2-23。

<sup>2</sup> 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年》，頁21-40。

<sup>3</sup> 廖隆幹，〈戊戌變法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対清外交〉，《日本歴史》，第471期(東京，1987.08)，頁68-84；茅海建、鄭匡民，〈日本政府對於戊戌變法的觀察與反應〉，《歷史研究》，第3期(北京，2004.06)，頁54-109。

<sup>4</sup> 伊原澤周，〈張之洞の聯日制俄政策與日本〉，收入苑書義、秦進才主編，《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44-160；陶德民，〈戊戌變法前夜日本參謀本部的張之洞工作〉，收入王曉秋主編，《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403-420；李廷江，〈日本軍事顧問と張之洞——1898-1907〉，《アジア研究所紀要》，第29期(東京，2002.03)，頁1-24；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戊戌維新前後的康、梁、張之洞與日本〉，收入孔祥吉、村田雄二郎著，《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係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頁76-122。

藤谷浩悅諸先生則著眼於中日民間人士策劃「中日結盟」的活動。<sup>5</sup>不過，以往研究一般忽視了此前發生的膠州灣事件的影響，對一些重要史實的梳理也有遺漏或偏差，因此尚有繼續深入的空間。<sup>6</sup>本文擬著重發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研究所、上海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等處所藏檔案史料，對此作一補證。同時，本文亦將從外交史的角度出發，以這一時期的中日關係為案例分析日本對華外交的多元性特徵。

## 二、膠州灣事件後日本外務省的反應

1897年11月14日，德國出兵登陸膠州灣。日本政府最初得到這一消息，則是在三天之後。代理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1868-1934)當日致電外務大臣西德二郎(1847-1912)，報告此事。西對此相當重視，立即通報總理大臣松方正義(1835-1924)、海軍大臣西鄉從道(1843-1902)與參謀次長川上操六(1848-1899)，並起草了上奏案。次日，駐華公使矢野文雄(1851-1931)也發電報告。<sup>7</sup>

接下來幾天當中，外務省主要忙於打探後續情報。隨即，外交對策也開始醞釀。11月20日，矢野向西報告，自己私下向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1823-1901)建議，由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1852-1915)擔任中德之間的調停人，對方表示同意，但竇納樂本人對此反應

<sup>5</sup> 桑兵，〈「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2006.06)，頁41-53；邱濤、鄭匡民，〈戊戌政變前的日中結盟活動〉，《近代史研究》，第1期(2010.02)，頁40-53；藤谷浩悅，《戊戌政變の衝擊と日本——日中聯盟論の模索と展開》(東京：研文出版，2015)，頁39-87。

<sup>6</sup> 以筆者所見，李國祁、藤谷浩悅兩先生是少數注意到膠州灣事件對中日關係具有重要意義的論者，見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頁96；藤谷浩悅，《戊戌政變の衝擊と日本——日中聯盟論の模索と展開》，頁214。

<sup>7</sup> 〈十一月十七日 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西外務大臣宛〉、〈十一月十八日 清國駐劄矢野公使ヨリ西外務大臣宛〉，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4)第30冊，頁339-44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3041173300(畫面1-7)，「独国ノ膠州湾租借關係一件 第一卷」。

冷淡。於是，李鴻章轉而尋求日本的援助。<sup>8</sup>次日西回電，表示膠州灣事件於日本關係匪淺，但認為在詳細瞭解德國的要求之前無法決定如何行動，因此要矢野進一步探聽德國的要求與英俄等國公使的意見，同時也同意他「向清國繼續表示厚誼」。<sup>9</sup>

對此，矢野翌日覆電稱，英國對德國表示同情，而俄法則對中國表示同情。他認為，如果德國對膠州灣的占領持續下去，那麼日本以援助中國為得計：「若然，將來無論距離臺灣遠近如何，清國之版圖貸與或割讓他國之際，便有充分理由對此提起異議。若失去這一良機，將來即使干涉如斯事件，也難以收到何等效果。」這是從長遠考量，企圖通過干涉膠州灣事件而使日本在將來的中國領土問題上獲得更大的發言權。同時，他還比照之前的三國干涉還遼，認為此次對德提出抗議是適當的。<sup>10</sup>

同日矢野還給西寫了一份長函，更加詳細地重申了自己的觀點。他甚至提出，應當集結艦隊以備不虞。不過，他還寫道，日本單獨對德抗議固然不可，但如果俄法兩國提出抗議，日本也不應坐視不動。<sup>11</sup>儘管他對俄法兩國的積極行動頗抱期望，但這也表明他認識到，日本終究沒有單獨干涉的能力。

11月24日，西指示矢野，鑒於時機尚未成熟，日本無法援助中國，而現下應當「不延誤時間且不訴諸武力，從速令本次德清間之葛藤達成妥協」，「應用閣下職權內之方法，使清國從速了結此事，達成上述之目的」。<sup>12</sup>次日上午，矢野前往總署會晤李鴻章。根據中方記錄的節略，矢野有以下四方面的舉動：一、作出示好姿態，並以「排解」為由，探聽德國所索條款。總署答以條款皆關教案，無須請別國排解，也沒有透露具體條款。二、打探各國

<sup>8</sup> 〈十一月二十日 清國駐劄矢野公使ヨリ西外務大臣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447。

<sup>9</sup> 〈十一月二十一日 西外務大臣ヨリ清國駐劄矢野公使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450。

<sup>10</sup> 〈十一月二十二日 清國駐劄矢野公使ヨリ西外務大臣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451-452。

<sup>11</sup> 〈十一月二十二日 清國駐劄矢野公使ヨリ西外務大臣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453-456。

<sup>12</sup> 〈十一月二十四日 西外務大臣ヨリ清國駐劄矢野公使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460。

公使是否在進行調停。總署仍表示現在僅由中德交涉，「此時各國可無須費心」。三、秉承西「達成妥協」的指示，勸中方對德妥協。總署對此沒有明確表態。四、隱然有充當中德之間調停者(至少是傳話人)的意圖：「聞海大人(引者按：即德國公使海靖，Edmund Friedrich Gustav von Heyking, 1850-1915)日內有照會與貴署，不知仍有何語，我今日下晚要去回拜海靖，貴署有話帶去轉告否？」總署於是托矢野告知海靖「速來署面商一切」。<sup>13</sup>

日方此時最關心的是德國開出的要求為何，西為此專門要求矢野打探。由於未能從總署處獲悉，他便根據來自竇納樂(被他認為在諸公使中消息最可靠)的情報作答。<sup>14</sup>接到並核查報告之後，西於11月30日電告矢野，在德國的六條要求中，<sup>15</sup>第五條(要求山東路礦權益)於日本不利：「帝國政府(第一)望清國不要承諾上述第五條，然清國如不能拒絕該第五條，則望確定山東鐵路之佈設線並限定礦山之地域而讓與之；(第二)清國倘若作以上之讓與，則望向各條約國開放膠州灣進行貿易。」西指示矢野伺機私下將此意告知李鴻章。<sup>16</sup>而李鴻章的表態很含糊，只說「相信對清國為良策」而已。因此，儘管矢野相信「本使之勸告多少已令彼為所動」，但也懷疑究竟有幾分效果。<sup>17</sup>

12月13日西又指示矢野，膠州灣事件如果不迅速解決，於中日兩國皆為不利，因此「對於德國政府向清國政府提出之要求，若在不致釀成他日大害之範圍內，清國政府應容許之，以從速和平了結事局」。他要求矢野盡力促成此事，同時也表示日本目前無法援助中國或對德抗議。<sup>18</sup>

次日，矢野向西報告，竇納樂個人反對德國強占膠州灣的要求，因此應

<sup>13</sup> 〈日本使臣矢野與李鴻章商談節略〉(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青島市博物館等編，《德國侵占膠州灣史料選編 1897-1898》(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頁148-149。

<sup>14</sup> 參見西與矢野往來諸電，《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456、462、467-470。

<sup>15</sup> 即海靖在11月20日照會中所列六條要求，見〈照錄德使照會內附開之六條〉(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德國侵占膠州灣史料選編 1897-1898》，頁141-142。

<sup>16</sup> 〈十一月三十日 西外務大臣ヨリ清國駐劄矢野公使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472。

<sup>17</sup> 〈十二月五日 清國駐劄矢野公使ヨリ西外務大臣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495-496。

<sup>18</sup> 〈十二月十三日 西外務大臣ヨリ清國駐劄矢野公使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513。

探明英國意見，考慮是否有英日合作抵制德國的可能性。西為此要求駐英公使加藤高明調查英方態度。12月18日加藤報告，英國外交副大臣的意見是：占據膠州灣於德國無甚好處，平時無用，戰時又容易遭到敵國攻擊。他認為，這大體可以代表英國政府的意見。<sup>19</sup>顯然，英國對此不甚在意。於是，矢野的提議被西壓下，未予回覆。此後直到膠州灣事件結束，西與矢野對此一直沒有什麼積極行動。正如外務省所編《小村外交史》所言：「我政府對膠州灣之態度如何，一言以括之，不外乎無力之沉默而已。」<sup>20</sup>事實上，從當時的國際環境來看，英、俄等主要列強雖然對德占膠州灣不無反感，但干涉的意願均不強烈。<sup>21</sup>

綜上可知，外務省在膠州灣事件發生後的對華外交方針是極其謹慎保守的。儘管日方認為德國的行動於日本利益有損，但沒有足夠的實力和決心插手此事。於是，西的基本策略是勸清政府儘快妥協了事，免得夜長夢多，進一步損害日本利益。自然，這並不是清政府所樂見的。雖然矢野有些較為積極的建議如請竇納樂調停、英日聯手干涉，但都沒有付諸實施。因此，儘管矢野在實際操作中竭力表現出一副示好的姿態，也沒有贏得多少清政府的好感，連德方的六條要求也未獲告知(形成對照的是，清政府很可能將六條要求私下透露給了他國如俄國)。<sup>22</sup>

<sup>19</sup> 〈十二月十四日 清國駐劄矢野公使ヨリ西外務大臣宛〉、〈十二月十六日 西外務大臣ヨリ英國駐劄加藤公使宛〉、〈十二月十八日 英國駐劄加藤公使ヨリ西外務大臣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516、521、524。

<sup>20</sup> 外務省編，《小村外交史》，(東京：新聞月鑑社，1953)，上卷，頁115。

<sup>21</sup> 菲利浦·約瑟夫著，胡濱譯，《列強對華外交(1894-1900)——對華政治經濟關係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頁189-205；托馬斯·奧特著，李陽譯，《中國問題：1894-1905年的大國角逐與英國的孤立政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頁83-97。

<sup>22</sup> 海靖曾在11月26日照會中嚴詞指責中方將六條要求透露給別國公使，而在次日會談中，總署大臣對此沒有正面否認。見〈德使海靖致總署照會〉(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軍機大臣翁同龢等赴德使館商談巨野教案問答節略〉(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德國侵占膠州灣史料選編 1897-1898》，頁152-154。軍機大臣兼總署大臣翁同龢(1830-1904)11月26日記載：「得德使照會二件，一辯教案，一指稱本署大臣漏泄六條於各館。(指合肥而言，並稱翁某官為所欽仰，張某官熟三洲商務，惟有一位漏言各館，蓋有所指也。)」見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第7卷(上海：中西書局，2012)，頁3111。他認為，洩漏者是李鴻章。若然，以李鴻章此時的外交態度，很可能是透露給了俄國。

雖然受到外交方針的限制，但作為對華外交的第一線代表，矢野在此表現出的外交能力也很平庸，最多不過無功無過而已。這也與他的專業素養有關：此時的日本，外交官專業化起步不久，外交界仍有不少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物，矢野就是其中之一。他畢業於慶應義塾，做過校長、記者、大藏省和宮內省官員，並且以政治小說知名。<sup>23</sup>他此前從未在外交界歷練過，擔任駐華公使只是因為與當時的外務大臣大隈重信(1838-1922)同一派系，被譏為不懂外交。<sup>24</sup>據時為駐華公使館一等書記官的林權助(1860-1939)晚年回憶，1897年底他前往北京赴任之前，伊藤博文(1841-1909)曾向他表示「北京現下處於棘手狀態，矢野恐怕無法勝任」。<sup>25</sup>在矢野的領導下，公使館的工作也顯得死氣沉沉。他的部下，公使館二等書記官榎原陳政(1862-1900)在翌年向大隈提出的一份《清國政況視察復命書》中，不留情面地批評了公使館的工作：

察現今公使館之形況，館員多染牢關固距之習，或蔑視清人，或嫌遠清人，不欲結歡廣交。藐視清國政府之政況及一般事情，不務體察審悉。於北京以外之事宜，更是度外視之，如風馬牛不相關，無所銳意研究，是以館員與清人間交友稀少寥寥，不足為怪。且於交友之事，往往止於禮容上之友誼，心衷阻疎，情意隔絕，不相通者多矣。是以不能與清廷有司等撤去城府，開拓胸襟，聯絡誠誼，詳悉底蘊，此乃必然之理。而館員等闇昧清國之風習慣例，於清國政府之組織、兵制、理財、刑獄等制度之概梗，無所諳悉曉通。各省督撫之人材賢否、意向所在，與施設之如何，無所偵悉。於各省民俗習氣之異同得失，無所察度。於如此要端，茫乎無所把握，彷徨五里霧裡，無異於局外人。<sup>26</sup>

榎原少年時跟隨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學習漢學，1882年來華留學，四

<sup>23</sup> 矢野的生平，參見小栗又一，《竜溪矢野文雄君伝》(著者自印，1930)。

<sup>24</sup> 千葉功，《旧外交の形成——日本外交1900-1919》(東京：勁草書房，2008)，頁5-9。

<sup>25</sup> 林權助，《わが七十年を語る》(東京：第一書房，1935)，頁83。

<sup>26</sup> 《清國政況視察復命書》，鉛印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イ14 A0892，頁29-30。該件無任何作者與日期信息，相關情況參見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13080200000，「機密雜件 第1卷」。

處收集情報，還列入大儒俞樾(1821-1907)門牆，馬關議和時擔任日方翻譯，是老資格的中國通。<sup>27</sup>或許是不便指名道姓地批評頂頭上司，他在復命書中沒有點矢野的名。不過，他就公使館工作的改進提出了五點意見，其中第一點就是「選擇公使、書記官等館員」。<sup>28</sup>顯然，他認為矢野不是一名合格的公使。

### 三、小田切萬壽之助、蔡鈞的中英日同盟謀劃

比起表現平平的矢野，地位較低的小田切卻顯得更加活躍。他是專業化培養出的新銳外政官員，訓練有素，工作忘我，而且精通中國語言與風習，此前曾任駐仁川、漢城領事館書記生、駐華公使館隨員、駐杭州領事等職，1897年任代理駐上海總領事。<sup>29</sup>上海是中國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在消息靈通方面甚至可說勝過北京，令他得其所哉。如前所述，膠州灣事件發生的情報，就是小田切首先報告給外務省的。他的報告，也往往比矢野詳實得多。而且，他雖然身為領事，理論上沒有外交權責，卻常以外務大臣的高度思考問題，甚至往往自作主張地實施外交行動。在同年12月31日致外務次官小村壽太郎(1855-1911)的一份長函中，他如此寫道：

本來領事官之職，專門辦理通商事務，與外交事務劃然有畛域，固不俟論；然而駐紮清韓兩國各港之領事官，與派往歐美各國之同職者境遇有異。於某種場合，有局部的外交官之奇狀，尤其以該國國土廣大，民生繁多，中央政府與地方官吏之間脈絡不相貫通，聲氣不相呼應，中央之權力未能及於地方，而地方之聲威時時凌於中央，駐在該國各港之各國領事官出於處辦事務之必要，自然具備局部的外交官之形體，洵為當今之實相。蓋駐在該國各港之領事官，堪稱半面帶領事官

<sup>27</sup> 楮原的生平，參見对支功勞者伝記編纂會編，《对支回顧錄》(東京：原書房，1968)，下卷，頁244-247。

<sup>28</sup> 《清國政況視察復命書》，頁31。

<sup>29</sup> 關於其人參見于乃明，〈小田切萬壽之助研究——明治大正期中日關係史の一側面〉，(筑波：筑波大學社會研究科博士論文，1998)，頁1-614；戴海斌，〈義和團事變中的日本在華外交官——以駐上海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為例〉，《抗日戰爭研究》，第3期(北京，2012.06)，頁48-62。

之名、半面備外交官之實之一種異狀官吏。<sup>30</sup>

小田切指出了當時清朝政治的一大特徵：中國幅員廣大，中央與地方溝通不暢，地方(即督撫)權勢甚重。因此，本來只負責地方通商事務的領事自然而然地成了「局部的外交官」。如此說，也是為他自己時有「越權」之嫌的行為辯護。接下來，他又寫道：

馬關條約茲成，日清戰爭結和以來，帝國政府對該國取何等政略，固非下官等所能預知，然而竊自推察方針之所在，當有對該國擴張我通商航船利益之計畫，固無須贅言。與之同時，誘掖該國官民，釐正國政，禦外國之覬覦，令其進於東方與我提攜者之地位。一言以蔽之，警醒該國之事，相信亦應為方針之一。是以下官赴任本地以來，夙夜不懈監視我通商航海之利益，同時對於本地有力官吏或民間之士，厚其交誼，通達彼我之情意，又說以宇內之形勢，促官民之反省，於此聊盡心力。<sup>31</sup>

小田切認為甲午戰後日本對清外交政策的一大重心是促進兩國「提攜」，因此就任之後盡力結交官紳。對於此函，次年1月20日西親自作覆，肯定了小田切對領事權限的看法，認可他的行動，還鼓勵他今後繼續如此工作。<sup>32</sup>

在此還應提到，頗有影響力的日方官修外交史《小村外交史》聲稱小村是甲午戰後誘導清朝親日這一外交政策的制訂者：

從那時(引者按：指小村1896年6月就任次官)起，小村基於預先腹案，漸次打開對清政策新生面，朝向令清國對我方繫以信望，從根底築起日清關係之方針一步一步前進。小村尤其以清國之開發為我對清經營之急務，其主旨為遊說張之洞、劉坤一有力者，從我國聘用顧問，並慫恿清國學生留學日本，以實現永遠鞏固日清兩國關係基礎之計畫。此方針乃我國當年對清關係之一紀元，而發意並開闢實行之端緒

<sup>30</sup>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小村外務次官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556。

<sup>31</sup>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小村外務次官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556-557。

<sup>32</sup> 〈一月二十日，西外務大臣ヨリ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1冊，頁327-328。

者，實為小村其人。<sup>33</sup>

小村此前曾任代理駐華公使、遼東占領地民政廳長官，比較熟悉中國情況。但鑒於此書的性質，<sup>34</sup>此說恐怕有過於美化小村之嫌。根據前引小田切致小村函，即使小村已有這種考量，駐華使、領也沒有收到指示，否則小田切也不會以一副妄參末議的口氣提出建議了。不過，小村倒是很可能促使小田切的建議上升為外務省的政策。

膠州灣事件的發生，給了小田切一個實施自己計畫的絕好機會：「以往該國官吏以親依本邦為得策者，徒止於空想，不免實效薄弱。趁此機會，有必要儘量面會重要之清官，貫達彼我之情意，兼令彼等腦中感知國政釐革之急務」。<sup>35</sup>1898年初，他向小村報告了自己「利用目下之形勢與本地有力之官吏往來交涉」的成果。<sup>36</sup>其中提及的清朝官紳包括：一、江蘇巡撫奎俊(1843-1916)。小田切於1897年12月前往蘇州，拜訪奎俊，「說以清國當以親倚本邦與整頓兵備為急務」。據稱對方表示贊同，並答應寫信勸告「北京當路之有力者」，還請小田切今後向他傳遞情報。小田切認為，以奎俊與朝中重臣榮祿(1836-1903)的叔侄關係，他的意見有可能影響到中樞。二、漢陽鐵政局總辦兼招商局幫辦鄭觀應(1842-1922)。小田切說，鄭氏與他關係親密，主張結交日英兩國，曾向吏部尚書孫家鼐(1827-1909)、安徽巡撫鄧華熙(1826-1916)密稟意見，這在中方史料中可以找到對證。《鄭觀應集》收有鄭觀應上呈給孫、鄧二人的一首論時事詩，其中言道：「環伺海疆盡虎狼，東鄰已悔闢於牆。明知和約不足恃，姑聯唇齒圖自強。」<sup>37</sup>所謂「東鄰已悔闢於牆」是當時日人遊說清人時常用的說辭，即日本後悔因甲午戰事與中國交

<sup>33</sup> 外務省編，《小村外交史》，上卷，頁103。

<sup>34</sup> 本書的底本是前外交官、早稻田大學講師信夫淳平(1871-1962)應外務省情報部長伊集院彥吉(1864-1924)要求撰寫的《侯爵小村壽太郎伝》(1922年脫稿，未出版)，之後經過修訂，以外務省名義出版。

<sup>35</sup>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小村外務次官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557。

<sup>36</sup> 〈一月二十八日 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小村外務次官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1冊，頁344-345。

<sup>37</sup> 〈上孫燮臣師相鄧小赤師帥論時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下冊，頁1231。

惡，「姑聯唇齒圖自強」則明白道出了中日聯交的主張。

鐵路總公司督辦盛宣懷(1844-1916)。盛氏固然是政商兩界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不過小田切表示，結交他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他影響湖廣總督張之洞，因為他已經脫離老上司李鴻章，成為張的「股肱之士」。小田切此時與他也走得很近。還有一人則是上海道蔡鈞(1850-1908)。1897年12月3日，小田切致電西：

海關道蔡鈞於本件(引者按：指膠州灣事件)發生之際正在蘇州，歸滬後大約會面兩次，但因另有來客，未得機會充分探明彼之意向。然兩三日前彼曾來訪，談及本件，懇懇陳述曰：東洋風雲漸急，此際清國可恃為友邦，共同維持亞洲大局者，非邦國(引者按：即日本)不可。蔡氏其先已懷抱此種意見，至近來愈感其急迫，據稱此前曾電稟總署及南洋大臣，若不與日本及英國敦交際，借兩國之力以救斯焦眉之急兼以維持亞洲局面，不知將如何了結本件。蓋自廿七八年戰爭(引者按：即甲午戰爭)後，該國之有識者不論朝野皆接近本邦，此乃無可置疑之事實。本件發生以來，面有眼之官民，叩其意見，愈增接近之度。<sup>38</sup>

蔡鈞，出身監生，曾任駐西班牙參贊，後於1901年任駐日公使。翁同龢對他的評價是「歷辦洋務，有能名，亦有小人之目」。<sup>39</sup>當時駐上海的日本海軍巡洋艦「筑紫」號艦長大井上久曆(1858-1920)則評價道，他是「文明主義之人」，善於交際，在上海的外國人中間風評不錯。<sup>40</sup>小田切稱，蔡鈞認為中國需要結交日本以及英國以應對危局，之前便曾向總署與兩江總督劉坤一(1830-1902)表達這一意見。不久之後，中日英同盟的謀劃愈發具體化。在前引小田切12月31日致小村函中，有如下記載：

如上海海關道蔡鈞，為主張依賴日英兩國渡過今次難局之一人。其人曾向總署及南洋大臣電稟意見，曾以機密信報告。而於本月十二三日左右，該人稱有秘密要務來館，摒退旁人，向下官面述，方今之形勢，

<sup>38</sup> 〈十二月三日 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西外務大臣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482。

<sup>39</sup> 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第6卷，頁2894。

<sup>40</sup>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檔號JACAR Ref. C06091099100(畫面8)，「明治30年 公文備考 演習艦船1卷4」。

日清英三國以立國之位置與商業之關係，不可不取同一運動，以禦俄法德三國之跋扈。除此案外，更無其他良策。下官對之問曰：當以如何之方法達此目的？該人並無何等考案，僅稱若我對彼之意見無異議，請稟達帝國政府。下官對曰：謹諾。貴意所在，當報告我政府。同時有閣下當執之方法，即將貴見之委細稟陳南洋大臣劉坤一及湖廣總督張之洞，轉達北京政府。若有力之總督與在京之大官一致協同，始得達此目的。彼云：南洋大臣、湖廣總督係懷抱同一意見，可不憚明言。此外，江蘇巡撫奎俊應當亦表同意。姑且先電稟劉張二總督，探其意向。分手後數日再面會蔡道，接回答稱，南洋大臣已將日清英三國協同運動之必要電稟北京。近日入手之貴地報紙載，北京來電稱，南洋大臣奏請藉日英兩國之力結定事局，與蔡道之談話一致，可認定南洋大臣立即採納蔡道之意見。唯張總督之意向如何，當時未聞知之。恰前任公使館附神尾陸軍步兵大佐自長江旅行歸來，鐵路大臣盛宣懷以起草該國兵制改革案之事密托於大佐，而此改革事業據聞乃出自張總督意中之事。可知張亦棄當年依賴俄國之僻說，有暗與本邦攜手之意向。要之，可認定目下該國督臣中有力之劉張二人於東方之形勢上親依本邦，此乃至為可慶之現象。<sup>41</sup>

據此，蔡鈞主張以中日英同盟抵禦俄法德三國，而小田切要求他向劉坤一、張之洞建言，轉達清政府，取得「有力之總督與在京之大官一致協同」。確實如報告所言，蔡鈞將聯盟英日之議稟達劉、張。劉坤一 1897 年 12 月 29 日致總署函中收錄了一份蔡鈞稟文，內稱：

職道日來與各國領事會晤，惟日本領事異常著急。職道惕以唇亡齒寒之意，伊乃盡吐實情，謂俄人之在海參崴〔崴〕者，聲言十萬，屢遣密諜，知不過近六萬。其出黑海之鐵艦欲保我東方者，號稱八千，實不能及四千。德兵在膠州者僅千二百人，即所調全來，亦不及萬。若以日本海軍制之，尚可有勝無敗。德人越國鄙遠，其水師亦素非頭等，殆無能為。惟中國朝廷向來徇俄，且辦事又不密，如能由此亟聯與國，

<sup>41</sup>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小村外務次官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557-558。

一旦事起，或可藉助他山而資扞禦。在日本既自顧其藩籬，英人亦必惜其商務，決可與中國立聯合密約，防禦俄德云云。職道所以謂聯絡英俄〔日〕為今時救急之著，不可因畏俄而坐失事機者也。<sup>42</sup>

在此，蔡鈞聲稱中日英同盟的提議出自小田切，恰與對方的說法相反。考慮到前引小田切 12 月 3 日報告已經提到蔡鈞主張聯盟日英，說了假話的恐怕是蔡鈞，其目的是增加自己提議的分量。不過，鑒於小田切一向致力於遊說清朝士紳親日，蔡鈞的提議，從源頭上看未必沒有小田切的影響。同時，蔡鈞幾度致電張之洞言及此事。12 月 11 日電稱：

昨接倭總領事面稱，倭副將神尾光臣、都司尾〔梶〕川重太郎昨晚搭「元和」赴鄂，念二准到鄂謁見帥座，面商要工。昨午西人密告，僉謂德聞英倭聯保東方商務，恐掣其肘，是以佯為議和，一俟大隊來華，即行開戰。並聞各領事言，防德聲東擊西，似據鎮江諸山炮台等語。雖未必確，然不可不防。謹密聞。<sup>43</sup>

此電提及兩事，一為日本軍官神尾光臣(1855-1927)、梶川重太郎(1864-1902)即將來鄂求見張之洞(詳後)，一為風聞德國陰謀對華開戰。考慮到之前蔡鈞與小田切的密謀，所謂「西人密告」可能是他編造的，目的是張大其詞，製造英日「聯保東方商務」的形象，以此為中日英同盟張本。張之洞對此兩事相當重視，12 月 13 日覆電稱：「德事若不速了，德大隊兵船一到，各國必紛紛效尤，大局將潰。聞倭定煤三十萬噸，恐是英、倭欲合謀占長江耳。」<sup>44</sup>同日，張之洞還將這一內容電告總署與直隸總督王文韶(1830-1908)(參見下文)。<sup>45</sup>綜合三電可知，張之洞並沒有對所謂「聯保東方商務」產生興趣，相反認為這只不過是英日合謀侵略長江的託辭。於是，蔡鈞於 12 月 16 日、24

<sup>42</sup> 〈總署收南洋大臣劉坤一函〉(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黃福慶主編，《膠澳專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225-226。

<sup>43</sup> 〈蔡道來電〉(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未刻發，酉刻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張之洞電稿》，函32第1冊，無檔號。

<sup>44</sup> 〈致上海蔡道台〉(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亥刻發)，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第9冊，頁272-273。

<sup>45</sup> 〈致總署〉(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亥刻發)、《致天津王制台》(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亥刻發)，《張之洞全集》第9冊，頁272。

日兩次致電張之洞，力圖證明所言不虛。<sup>46</sup>不過，僅憑他的口舌，還不容易打動劉坤一、張之洞這等大員。就在此時，日本軍方又有動作。

#### 四、神尾光臣來華的影響

神尾光臣來華一事，頗受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者關注，不過一般僅將其視為張之洞與日本接近的開始，沒有放在更加廣闊的視野下考察，對具體史實的梳理也有欠細緻，本文對此將加以深化與細化。

神尾出身諏訪藩，畢業於訓練士官的陸軍教導團，西南戰爭中升為軍官，最終官至陸軍大將。他此前的履歷多是在參謀本部工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曾於 1882-1886 年間來華從事情報活動，1892 年再度來華並充任公使館武官，甲午開戰後出任第二軍情報主任參謀，戰後再任駐華武官，1897 年 10 月剛剛晉升大佐，轉任近衛步兵第三聯隊長。<sup>47</sup>在日本防衛研究所現存檔案中，可以看到甲午戰爭前後他發出的大量情報。在當時，他可以說是日本陸軍的頭號中國通。

關於神尾此次來華的背景，相關材料甚缺，一般僅知道他自稱受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的派遣。川上自 1889 年起長期擔任參謀次長，比起以皇族身份出任總長的小松宮彰仁親王(1846-1903)及其前任有栖川宮熾仁親王(1835-1895)，他才是參謀本部真正的靈魂人物。遺憾的是，川上留下的資料甚少，筆者在日本軍方檔案中亦未覓得派遣神尾的線索。不過，在德富蘇峰(1863-1957)所著川上傳記中有如下記載：

明治二十八年，下關係約方締結也，大將(引者按：即川上)之慧眼早已看破東亞問題之將來，乃期先提攜清國以完整對俄作戰之準備。而彼第一著手之事，則是派遣大將之股肱心腹，俊秀之參謀，或彼之手足耳目，精英之武官，前往南北支那之要地，結要路者之歡心，實踐日

<sup>46</sup> 〈蔡道來電〉(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子刻到、十二月初二日申刻到)，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以下簡稱河北版)第9冊，頁7438、7442。

<sup>47</sup> 神尾的生平，參見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頁48；《對支回顧錄》，下卷，頁256-259。

清提攜之策。

接下來，書中提到了幾名這樣的「俊秀」、「精英」，其中第一名便是神尾光臣。作者稱：「三十一年(引者按：1898年)，彼銜大將之旨，與清國當路之文武官往來，結其歡心。日清融和之端緒，由彼之努力而啟」。<sup>48</sup>另據當時在漢口任《漢報》主筆的大陸浪人岡幸七郎(1868-1927)說，時任參謀本部第三部長的福島安正(1852-1919)曾向川上建言，鑒於張之洞是主張反日的急先鋒，為了轉變中國的反日思潮，促進中日關係的緩和，「除勸說最為頑固之張之洞外別無他法」，川上採納了這一提議。<sup>49</sup>

由此可見，神尾此行專為交結清朝大員、博取對日好感而來。他的第一站應當是天津。時任新建陸軍參謀營務處總辦的徐世昌(1855-1939)在1897年11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全軍合操，有日本兵官來看，陸軍大佐神尾光臣，水軍少佐瀧川具和」。<sup>50</sup>不過，他在天津似乎沒有太多活動。12月8日，他乘船抵達上海。<sup>51</sup>隨後，蔡鈞告知張之洞，「倭副將神尾光臣、都司尾〔梶〕川重太郎昨晚搭『元和』赴鄂，念二准到鄂謁見帥座，面商要工」，即前引12月11日電。

與神尾同行的梶川重太郎，畢業於陸軍大學校，時為陸軍大尉、參謀本部職員。<sup>52</sup>他於11月28日從長崎出發赴滬，之後「遊歷江浙交界」，在神尾光臣來滬前一天回滬。<sup>53</sup>二人事先可能有所約定。

對蔡鈞的電報，張之洞12月12日回電表示：「日本副將來鄂，本願延接，惟弟現奏明赴京山查勘堤工，即日啟行，回省尚無定期，如必有要事面商，當由江漢關道飛速函告。」<sup>54</sup>以筆者所見，幾乎所有研究者論及此節時

<sup>48</sup> 德富豬一郎，《陸軍大將川上操六》(東京：第一公論社，1942)，頁179-180。

<sup>49</sup> 岡幸七郎，〈天囚博士と張之洞〉，收入宮里立士、佐藤哲彥編集，《大阪出版文化資料集》，第1卷《碩園先生追悼錄》(東京：ゆまに書房，2012)，頁141。

<sup>50</sup> 《徐世昌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3卷，頁1370。

<sup>51</sup> 'Passengers', 'Arrives', *North-China Herald*, Dec.8, 1897, 1059, 1069.

<sup>52</sup> 梶川的生平，參見《對支回顧錄》，下卷，頁1056-1057。

<sup>53</sup> 大里浩秋整理，〈宗方小太郎日記 明治30-31年〉，《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報》，第40期(橫濱，2010.03)，頁42-43。

<sup>54</sup> 〈致上海蔡道台〉(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已刻發)，《張之洞全集》第9冊，頁272。

都作出了張之洞是藉機回避的解讀。<sup>55</sup>不過，如果仔細考察張之洞的行程的話，可以發現這種解讀未必嚴密。所謂堤工，是指湖北京山縣西南的唐心口堤，去年夏間因漲水潰決，本年春季築而復潰，此時正在趕工修復。河工向來是地方要務，張之洞前往查勘是應有之義。在接到蔡鈞來電前幾天，他已經安排好了行程。其幕僚陳慶年(1862-1929)在12月9日的日記中記載：「南皮師(引者按：即張之洞)前日面約，同至京山縣唐心口堤。」而在12月12日上午，張之洞已經登上座船。蔡鈞的電報，是張之洞幕僚錢恂(1854-1927)特地趕到船上交給張的。<sup>56</sup>如此，張之洞自然不可能安排接見。

不過話說回來，即使張之洞當時未定行程，也極有可能避而不見。前文曾經提及的大井上久磨稱，張之洞一向不願見日本人：「尊大自重乃清人之常態，據云如張之洞更為其最甚者。彼眼中無歐美，更無論日本。故向來本邦人欲求面謁，不問官民，常藉故謝絕之。」<sup>57</sup>駐沙市領事永瀧久吉(1867-1942)也說，張之洞「向來盡力回避接見本邦官吏」。<sup>58</sup>在張之洞檔案中也可以找到佐證：兩個多月前，他曾以「日來公事甚忙，體中亦覺不適」為由拒絕了大井上的前任石井豬太郎(1852-1932)的求見。<sup>59</sup>

更何況，對神尾、梶川來鄂，張之洞一開始的判斷是日本人不懷好意。在張之洞回覆蔡鈞的當天，江漢關道瞿廷韶(1838-1903)致函當時在武昌的盛宣懷，打聽「倭將廿二日可以抵漢，不知究因何事」。函中還提到他為張之洞送行時，對方「談及英、倭合謀一說，乃得自外國新聞報中」。<sup>60</sup>同日，盛

<sup>55</sup> 如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年》，頁25；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205；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248。

<sup>56</sup> 明光整理，〈《橫山鄉人日記》選摘〉，《近代史資料》，第76期(1989)，頁206。

<sup>57</sup>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檔號JACAR Ref. C06091186700(畫面45)，「明治31年 公文備考 外國人建白請願外交及請願上 卷23」。

<sup>58</sup> 〈一月十七日 沙市在勤永瀧領事ヨリ小村外務次官宛〉，《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冊，頁324。

<sup>59</sup> 〈漢口瞿道來電〉(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戌刻發)，王金科選輯，〈張之洞電稿(二)〉，《文物春秋》，第2期(1990)，頁83；〈致漢口瞿道台〉(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三日亥刻發)，《張之洞全集》第9冊，頁255。

<sup>60</sup> 〈瞿廷韶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陳旭麓等主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義和團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1。

宣懷又致電劉坤一、王文韶，報告了這一消息：「英、倭有合保東方之說。季〔香〕帥(引者按：即張之洞)云：倭副將兩員，日內來鄂，面商要事，伊兩國欲想藉此占守長江炮臺等語。」<sup>61</sup>如前所述，張之洞此時因被蔡鈞告知英日「聯保東方商務」，認定兩國對長江有所圖謀。12月14日，張之洞本人亦致電總署：

上海道蔡鈞電，倭總領事告倭副將一員、都司一員，來鄂見洞，面議要事，已自滬啟行，一二日即到。蔡又電，聞英、倭有合保東南商務之說等語。久聞英有圖占長江之謀，又聞倭已定煤三十萬噸。此次遣武員來鄂，必非議商務、租界可知。然則所謂保商務者，恐是英、倭合謀藉口，欲以兵力踞長江險要耳。總之，德事若不速了，德大隊兵船一到，各國紛紛效尤，大局將不可問，危險之至。德欲甚奢，甚難就範，但恐愈遲則愈難矣。俟倭將到後，情形如何，當即電達。<sup>62</sup>

同日致王文韶的電報大意略同。<sup>63</sup>由以上幾份電報可知，張之洞將神尾來鄂與英日「聯保東方商務」、「英國圖占長江」、「日本定煤三十萬噸」幾條傳聞聯繫起來，又放在膠州灣事件刺激列強貪欲的背景下理解，認定對方心懷叵測。瞿廷韶對此也認為：「膠事未定，德焰方張，東西鄰環伺尋釁，乃意中必有之事。」<sup>64</sup>不過，神尾在武昌先後會見瞿廷韶、錢恂與盛宣懷之後，給他們留下的印象卻不壞。盛宣懷12月16日致函張之洞稱：「神尾先見瞿道、錢守，頃來長談，其意甚深遠，殊難形諸筆墨。好在俱是遠著，不妨俟面譚。所請酌派武備學生赴彼軍操習兵事，似可應允。」<sup>65</sup>同日亦致電劉坤一，內容大體相同。<sup>66</sup>至於具體會談內容，由張之洞1898年1月2日致總署電中可以

<sup>61</sup> 〈盛宣懷上劉坤一、王文韶電〉(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王爾敏、吳倫霓霞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311。

<sup>62</sup> 〈致總署〉(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亥刻發)，《張之洞全集》第9冊，頁273。

<sup>63</sup> 〈致天津王制台〉(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亥刻發)，《張之洞全集》第9冊，頁273。

<sup>64</sup> 〈瞿廷韶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義和團運動》，頁1。

<sup>65</sup> 〈上香帥書〉(廿三日)，北京大學歷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懷未刊信稿》(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56。

<sup>66</sup> 〈盛宣懷上劉坤一電〉(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頁313。

知道大概：

倭參謀部副將神尾光臣到鄂，洞出省未回，江漢關道及洋務委員見之。伊深談傾吐，大略言，前年之戰，彼此俱誤。今日西洋白人日熾，中東日危，中東係同種、同文、同教之國，深願與中國聯絡。此係其國陸軍二等提督川上操六之意，命之前來，囑轉告洞等語。<sup>67</sup>

神尾一方面以「彼此俱誤」輕輕揭過甲午舊仇，一方面以亞洲主義說辭遊說親日。「白人日熾」（隱寓與「黃人」的二元對立）、「同文同種同教」云云，在日本早屬陳詞濫調，但在此時的中國尚不十分流行。在膠州灣事件的背景下，這一套對於清朝官員來說顯得頗為入耳。

查勘堤工完畢之後，張之洞於12月21日回到武昌。<sup>68</sup>得悉會見神尾的情況後，他致電劉坤一，通報了情況：「倭將神尾來鄂，弟適出省，關道接見。伊諄諄以派員往倭觀操及派學生往學武備為請，以為此聯交入手處，餘無他語，特奉聞」。<sup>69</sup>此電的語氣尚屬平淡。然而幾天之後，張之洞的態度轉趨積極。12月27日，他致電蔡鈞，表示「來意在聯交及派人就學，頗關大局，似尚有含意未申處。今擬邀渠等重來相見，面商切實詳細辦法，鄙人亦有要語與之相商」，要他設法聯絡神尾。同時亦傳遞了一份致神尾的電報，請他來鄂面談中日「聯為一氣」的詳細辦法。由於不知神尾此時在何處，他要求蔡鈞「轉蘇、杭、寧波等處探投」。<sup>70</sup>

張之洞同日亦致電浙江巡撫廖壽豐(1836-1901)，要他代邀神尾來鄂。<sup>71</sup>次日，他再度催問蔡鈞，神尾是否願意來鄂。對方覆稱神尾已於12月24日回國。<sup>72</sup>由於小田切當時正在蘇州出差，蔡鈞只得一面發電報給他，一面直接

<sup>67</sup> 〈致總署〉(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巳刻發)，《張之洞全集》第4冊，頁462。

<sup>68</sup> 〈《橫山鄉人日記》選摘〉，頁211。

<sup>69</sup> 〈致江甯劉制台〉(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戌刻發)，《張之洞全集》第9冊，頁274。

<sup>70</sup> 〈致上海蔡道台〉(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巳刻發)、〈致日本參謀大佐神尾君光臣〉(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巳刻發)，《張之洞全集》第9冊，頁276。

<sup>71</sup> 〈致杭州廖撫台〉(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巳刻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張之洞電稿乙編》，函11第2冊，檔號甲182-72。

<sup>72</sup> 〈致上海蔡道台〉(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戌刻發)，《張之洞全集》第9冊，頁276；〈蔡道來電〉(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酉刻發，戌刻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張之洞電稿》，函32第2冊，無檔號。

致函日本陸軍省。小田切 1 月 2 日致電小村壽太郎通報此事，兩天後又致函詳述。小村接到報告後，於 1 月 19 日知會川上操六。<sup>73</sup>神尾旋即再度來華。根據《北華捷報》刊載的旅客消息，他在 1 月 28 日由橫濱抵達上海。<sup>74</sup>他之所以如此往返奔波，可能與此時喪父有關。<sup>75</sup>

那麼，張之洞對神尾的態度何以驟然積極起來？關鍵在於這幾日間他得到的消息。其一是前述蔡鈞的不斷遊說，其二是候補道沈敦和(1866-1920)的情報。沈敦和時任自強軍營務處總辦，率軍駐紮吳淞。當時有「英將」即某名訪問吳淞的英國艦長向他表示中英日三國應當結盟，「在中日則保疆土，在英則保東方商利」。<sup>76</sup>根據日方檔案，此人應為巡洋艦「不悅」號(HMS Pique)艦長科利上校。<sup>77</sup>他當時也曾向前文提到的日本同行大井上表示相近的意見，不過沒有提到中國：俄國為英國和日本的共同敵人，兩國在遠東應有所作為。而俄德兩國「恰如同一體」，德占膠州灣，俄占旅順口，互相呼應，故日本應永遠占領威海以保均勢。<sup>78</sup>蔡鈞與此人可能也有某種程度的互動。他 12 月 14 日致電劉坤一、盛宣懷稱：「頃據英官密談，英恐俄法德與中為難，有礙商務，約倭助中，保全亞洲大局，不日各艦集長崎，藉觀三國動靜。又，英慮三國占旅順口、膠州及鎮江，並防其據浙江舟山等島，擬率大隊水師於舟山以示軍威，亦未可知云。前日泊浦東英巡船比克該管駕接港布提督電命，往吳淞候令，已開駛矣。」<sup>79</sup>「英巡船比克該」即「不悅」號。

「英將」意見經由沈敦和上達，與小田切、蔡鈞密謀的模式很像。由於

<sup>73</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7090025500(畫面11-13)，「清国兵制改革一件(清国ニ於テ帝國武官招聘ニ関スル件)第一卷」。

<sup>74</sup> 'Passengers', 'Shanghai Shipping Intelligence', *North-China Herald*, Feb.7, 1898, 202, 213.

<sup>75</sup>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大日記》，檔號JACAR Ref. C07082241500、C07082241800，「明治31年 參謀本部大日記 參月」。

<sup>76</sup> 〈南洋大臣劉坤一致總署電〉(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國侵占膠州灣史料選編 1897-1898》，頁290。

<sup>77</sup>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檔號JACAR Ref. C10126109500(畫面18)，「明治30年 公文雜輯 卷7 艦船1」。其名係音譯，原文為日文假名「コーレ一」。

<sup>78</sup>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檔號JACAR Ref. C06091152800(畫面15-16)，「明治31年 公文備考 艦船2卷5」。

<sup>79</sup> 〈膠事函電抄存〉，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檔號037658。

史料不足，筆者還難以分析內中是否有什麼謀劃。以英國此時的外交政策看，這背後恐怕沒有高層的授意，更像是個人的率性發言。<sup>80</sup>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意見與蔡鈞的建言、神尾的來華一同形成了三重唱，對劉坤一、張之洞產生了影響。

12月18日，劉坤一致電總署，告知昨晚接到沈敦和電報，「英將」提議中英日聯盟。此電並非「請代奏」的電奏，但次日呈遞，當天即有電旨下達，表示了謹慎態度：「僅聯一二國，此輕彼重，適啟爭局，恐非長策」。該旨除寄劉坤一外，同時發給張之洞、王文韶，要他們「從長計較，各抒己見」。<sup>81</sup>張之洞接到電旨後，因見到「英將」字樣，致電劉坤一詢問。收到回電後，張之洞對此很感興趣，一再向沈敦和詢問。<sup>82</sup>

關於「英將」的談話，劉坤一在12月29日與1月6日致總署函中附上了兩份談話節略，可知詳情。其主要內容是：「英將」聲稱德國早在三國干涉遼東時便與俄法議妥侵占膠州灣，接下來俄國將侵略東北，德國將侵略山東全省，法國則將侵略兩廣，這有礙英日兩國利益。又標榜英國海軍實力甲於全球，日本則與中國誼屬同洲，故中國應與英日結盟以對抗德法俄，更著重指出「特慮中國不自危懼，轉與俄權以引虎自衛耳」。此外還批評德國陸軍訓練「利於勝不利於敗」，聲稱英式訓練更佳。不過，這位艦長也老實地承認，這只是他的個人意見，與英國政府無關。<sup>83</sup>

儘管12月19日電旨對聯盟英日不表贊同，但劉坤一仍兩度向總署轉述「英將」之言，傾向性很明顯。他本人也在致總署函中評論道：「英將所云雖未足遽以為信，然其所論俄德情勢固已洞若觀火，燭及隱微」，「惟有虛與委

<sup>80</sup> 關於當時的英國對華政策，可參見王世宗，〈「新帝國主義」中的逆流：莎士保理與英國的遠東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臺北，1996），頁109-115。

<sup>81</sup> 〈南洋大臣劉坤一致總署電〉（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軍機處寄劉坤一、王文韶、張之洞電旨〉（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德國侵占膠州灣史料選編 1897-1898》，頁290-291。

<sup>82</sup> 參見張之洞與劉坤一、沈敦和來往諸電，《張之洞全集》第9冊，頁273-274、276；《張之洞全集》（河北版）第9冊，頁7448。

<sup>83</sup> 〈總署收南洋大臣劉坤一函〉（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總署收南洋大臣劉坤一信〉（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膠澳專檔》，頁227-228、359-360。

蛇，密為聯屬，以期互相牽制，或可暫濟目前」。<sup>84</sup>他 12 月 23 日還致電盛宣懷轉示張之洞，要他「助聯英、倭之說」。張之洞回電詢問有何具體辦法，劉坤一則表示英日兩國均未給出具體辦法，反過來諮詢他的意見。<sup>85</sup>

## 五、宇都宮太郎訪鄂與張之洞結聯日英的提議

正在此時，又一名日本軍官來鄂。此人是陸軍大尉宇都宮太郎(1861-1922)，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與陸軍大學校，自 1892 年起長期在參謀本部任職，時為第三部部員，日後升至大將。<sup>86</sup>與他同行的是大阪《朝日新聞》的名記者西村時彥(1865-1924)，其人漢學功底深厚，據稱為同鄉川上所邀，以便與素稱飽學的張之洞交談。<sup>87</sup>

宇都宮、西村兩人於 1897 年 12 月 24 日到達漢口。據西村的日記，他 12 月 31 日赴總督衙門拜訪張之洞，宇都宮應當與他同見。可能是出於謹慎，他在當天日記中記載了張之洞的詳細生平，卻對會見的內容一字不提。<sup>88</sup>不過，他的文集中收錄了當時呈送張之洞的一份《論時事書》和一份《聯交私議》，可見他藉膠州灣事件為引，極力鼓吹清朝聯日。<sup>89</sup>宇都宮則有更詳盡的記載。《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中有 7 份他在湖北時寫給參謀本部第三部長福島安正的報告草稿，編為臨時第二至八號(第一號缺失)，其中記錄了他與張之洞及其幕僚錢恂、姚錫光(1857-1921)的多次會見。<sup>90</sup>西村於 1898 年 1 月

<sup>84</sup> 〈總署收南洋大臣劉坤一函〉(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膠澳專檔》，頁 224-225、359-360。

<sup>85</sup> 〈致江甯劉制台〉(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午刻發)，《張之洞全集》第 9 冊，頁 276；〈劉制台來電〉(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申刻發，亥刻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張之洞電稿》，函 32 第 2 冊，無檔號。

<sup>86</sup> 齋藤聖二，〈明治期の宇都宮太郎——駐英武官・連隊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收入宇都宮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東京：岩波書店，2007)，第 1 卷，頁 3-7。

<sup>87</sup> 陶德民，〈戊戌變法前夜日本參謀本部的張之洞工作〉，頁 405。

<sup>88</sup> 〈江漢遡洄錄〉，收入懷德堂記念會編，《碩園先生遺集》(大阪：懷德堂記念會，1936)，第 1 卷，頁 56 上、60 下。

<sup>89</sup> 〈聯交私議〉、〈與張制軍論時事書〉，收入《碩園先生遺集》，第 1 卷，頁 1 上-7 下、59 上-63 上。

<sup>90</sup> 〈臨時報告第二號(控)-第八號〉，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藏，《宇都宮太郎關

10日離開武昌，遊歷安慶、南京、上海之後回國。而宇都宮則逗留較久，之後陪同姚錫光率領的湖北考察團赴日。<sup>91</sup>

宇都宮的來訪，顯然堅定了張之洞的決心。於是，繼劉坤一向總署表露聯盟英日之意後，張之洞率先將此事上奏。1月2日，張之洞接連三次致電總署請代奏。其中第一電提出，解決當下危機的要著首先在於「迅速兼聯英、倭」。此電的重心在論聯英。張之洞認為「竊揆今日情事，必須將英國安頓妥帖，善為羈縻，不然必有急禍」，原因在於英國在遠東海軍實力強大，現下又有派艦駛入長江之議，「我若聯英，尚可與商和緩辦法，我不聯英，彼自用兵力強占矣。」

另兩電則專言日本的建言，其中可見宇都宮的作用：

近日其參謀部員宇都宮太郎又來鄂見洞，致其提督川上操六之命，送日本地圖及政治書各一部，語極殷勤，意在兩國聯絡。並言，今日武備最要，囑派人到彼入武備及各種學堂，地近費省，該國必優待切教等語。復密向委員談，倭已與英聯盟，倭願助中，助有三法：一、用兵船。倭船足能敵俄、德現派來之船，但恐續到船多。一、用口說勸解，但恐不聽。一、聯英以助中。惟第三法尚易行等語。洞因其官階較小，令電致神尾光臣，令速再來鄂，來時問明川上操六及其管陸軍小松王（引者按：即參謀總長小松宮彰仁親王）主意，伊已發電矣。大抵倭見俄日強，德日橫，法將踵起，英亦效尤，海口盡占，中國固危，倭四面皆受強鄰之逼，彼亦危矣。故今日急欲聯英聯中以抗俄、德，而圖自保。彼既願助，我落得用之。蓋倭不能抗俄、德，英水師則能之。聯倭者所以為聯英之樞紐也。倭肯出力勸英與我聯，則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藉英之援助矣。我不與倭聯，則彼將附英以窺長江矣。倭人此舉，利害甚明，於我似甚有益。俟神尾來晤後，即詳陳。請代奏。日本參謀宇都宮今晚又密告，伊此來實係奉其內旨而來，密商聯交之事，語尤切實，且勸我聯英。力諫聯英之利，不聯英之害，頗有辦法。

係資料·書類》，檔號148。據1月4日的第二號報告，錢、姚稱「張制軍希望再次見兄」，可見此前宇都宮已見過張之洞。

<sup>91</sup> 〈劉委姚錫光等前往日本遊歷詳考各種學校章程〉（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張之洞全集》第6冊，頁108。

察其語氣，似英人陰謀，倭已全知。今晨蒸兩電奏想已上達，伏懇諭示此事大指，以便斟酌相機酬對。請代奏。<sup>92</sup>

兩電所述宇都宮言論，主旨與前次神尾所言大體相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向張之洞聲稱自己「奉其內旨而來，密商聯交之事」，讓對方覺得「語尤切實」。所謂「內旨」，按當時的語境應指天皇的旨意，或至少是日本政府的命令。但在宇都宮 1 月 31 日撰寫的報告稿開頭，卻有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本月十三日來示，於前日即二十九日拜接謹遵。向來若是信為稍顯重大、關係將來之事項，必先充分明瞭此為下官一己私見，未能代表川上閣下等之高見，辯明之後方才發言。決不敢得意忘形，放言快語，貪一時之快，演出如此狂態。」<sup>93</sup>由此觀之，其上司福島安正似乎對他此前的報告(從時間上看，應是缺失的第一號報告)有所不滿，認為他的言行有越權之嫌。而他辯稱自己言及重大問題時都聲明只是個人觀點，參照「內旨」之語，顯然沒有說實話。之所以謊稱奉有「內旨」，大概是因為張之洞嫌他「官階較小」，不肯深入商談。不過，他的誇張之辭，卻令張之洞更加確信日方的「誠意」。

另外需要指出，張之洞雖然建議結聯英日，對兩國的態度卻頗有差異。對於英國，極力強調其海軍力量對中國的威脅，之前「英國圖占長江」的傳言顯然仍令他十分警惕。結聯英國，在他看來是不得已而為之。相反，他認為日本與中國利益一致，對聯日的態度顯然積極得多。

同日，張之洞又致電劉坤一、王文韶，告知自己已奏請聯盟英日。<sup>94</sup>劉坤一回電稱「管見幸不戾於尊指，得鼎言當可動聽」，而指出「明聯」為俄國所忌，最好如盛宣懷所言「就商務聯絡之法」。王文韶態度不很積極，不過也說「德事無論如何，定局終當借英以掣俄耳」，他更關心的顯然是眼下俄國軍艦泊旅順一事。<sup>95</sup>而在 1 月 4 日，清廷下旨，否決了張之洞的提議：

<sup>92</sup> 〈致總署〉(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辰刻發、巳刻發、亥刻發)，《張之洞全集》第4冊，頁461-462。

<sup>93</sup> 〈臨時報告第二號(控)第八號〉，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藏，《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書類》，檔號148。

<sup>94</sup> 〈致江甯劉制台、天津王制台〉(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亥刻發)，《張之洞全集》第9冊，頁278。

<sup>95</sup> 〈劉制台來電〉(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戌刻到)、〈王制台來電〉(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到)，《張之洞全集》(河北版)第9冊，頁7452-7453。

「中日修好之後，本無不洽。若遂連衡，恐北方之患必起。倭將所請，斷勿輕允，是為至要。」<sup>96</sup>

與此同時，張之洞已有自行辦理聯日外交的考慮。12月31日，他致電在上海的候補道鄭孝胥(1860-1938)，聲稱「有重大緊要事奉商」，要對方迅速來鄂。鄭孝胥於1月8日抵鄂。當天日記載：

至督署謁南皮，談有頃。所言日本使人來勸聯英拒德事。南皮欲余偕日人川上者赴日一行，而電奏尚未奉旨。余曰：「日人既有此意，胡不言之於總署？宜令彼公使自言，而我公助之乃可爾。」南皮曰：「此事宜熟計。有日本小松王子所遣人於正月初六可到，子明日來吾署中，以便商酌此事。」<sup>97</sup>

鄭孝胥此前在日三年，曾任築地副領事、神戶兼大阪領事，張之洞顯然看中了他的這段經歷，打算派他赴日辦理聯交。而他指出了問題的要害：此舉並未奉旨，甚至沒有知會總署。對此，張之洞含糊其辭。事實上，由於中樞此時並不同意聯盟英日，他不可能走正式的外交管道，派遣鄭孝胥必然是秘密行為。

然而，湖南巡撫陳寶箴(1831-1900)1月16日的一通電奏卻將此事捅上了檯面。該電首先提到神尾、宇都宮來鄂與聯盟之議，主張「先降密旨，責成張之洞速即派人往日遊歷，面見日政府，確詢聯英事實，飛電報聞」，然後稱：「聞張之洞擬派鄭孝胥、喬樹柟、姚錫光三員往日本遊歷，該員皆有血性，明大計，切實可靠，惟望聖明迅賜飭行。」<sup>98</sup>喬樹柟(1850-1917)，時為刑部候補主事，與張之洞關係密切。姚錫光，時任湖北武備學堂提調兼自強學堂總稽查，是張之洞幕中有數的洋務人才。

陳寶箴的消息，很有可能來自其子三立(1853-1937)。陳三立12月從湖

<sup>96</sup> 〈軍機處電寄張之洞諭旨〉(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2)，第51卷，頁9下。

<sup>97</sup>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1冊，頁635-636。

<sup>98</sup> 〈收湖南巡撫電〉(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第35冊，頁344。按，十二月二十六日(1月18日)為收電日期。據電末韻日代碼「敬」，該電發於二十四日(1月16日)。

南赴江西，途經武昌，曾會見張之洞和宇都宮。<sup>99</sup>據張之洞幕僚陳慶年記載，1月5日他在武昌赴宴時，席上曾談及聯交之事。當時同座者除陳三立外，恰有陳寶箴電奏中提到的喬、姚二人。<sup>100</sup>陳三立後來還在1月19日致電張之洞稱：「禍變愈急，外聯之策望速圖，稍遲無及。」<sup>101</sup>

陳寶箴與張之洞共事甚久，關係融洽，政務上也時常相互配合。<sup>102</sup>他得知張之洞遣使赴日的計畫，便主動上奏，自以為是從旁協助，卻不知道自己恰恰幫了倒忙。張之洞收到陳寶箴告知此事的電報後，連忙致電總署自我辯解，聲稱「陳電實屬遠道訛傳誤聽」，自己只是打算派鄭孝胥明年帶學生赴日留學，並不涉及聯英。<sup>103</sup>對照前引鄭孝胥日記可知，這完全是避重就輕的說法。鄭孝胥之後在日記中再也未提此事，他於1月15日動身回滬。<sup>104</sup>派鄭赴日一事，就此告吹。以張之洞的行事方式，如果認定於事有補，即使未獲授權，他也會暗地去做。然而一旦事情洩漏，他也不敢擔著違旨的罪名硬幹下去。

較陳奏稍早，掌江西道監察御史王鵬運(1849-1904)於1月11日上有一摺一片，亦請求密結英日。其中正摺提及「風聞日本陸軍大佐〔尉〕宇都宮往漢口見張之洞，自言奉彼國密旨，為我聯英拒德」，認為機不可失，並主張「一面飭下翁同龢、張蔭桓此時暫與德使故為往復，藉延時日；一面飭下張之洞速揀幹員密往東洋與彼商定」。附片則提議「此時結倭聯英，止可由外派員潛往，或借採辦洋銅為名，前赴東洋，事成固善，不成亦不致聲張，致涉痕跡」。<sup>105</sup>

孔祥吉先生認為，這一摺一片是康有為(1858-1927)代擬的，茅海建先生

<sup>99</sup> 馬衛中、董俊珏，《陳三立年譜》（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頁209-211。

<sup>100</sup> 〈《橫山鄉人日記》選摘〉，頁214。

<sup>101</sup> 〈陳主事來電(自九江來)〉（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巳刻發，巳刻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張之洞電稿》，函36第1冊，無檔號。

<sup>102</sup> 茅海建，〈張之洞與陳寶箴及湖南維新運動〉，《中華文史論叢》，第3期（上海，2011.09），頁224-263。

<sup>103</sup> 〈致總署〉（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亥刻發），《張之洞全集》第9冊，頁281。

<sup>104</sup> 《鄭孝胥日記》第1冊，頁637。

<sup>105</sup> 〈掌江西道監察御史王鵬運摺〉（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掌江西道監察御史王鵬運片〉（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德國侵占膠州灣史料選編1897-1898》，頁315-317。

也表示贊同，並找到了原摺、片。<sup>106</sup>但筆者認為似有商榷餘地。首先，正摺中提到宇都宮會見張之洞，提議聯盟。此事雖非十分機密，但也沒有廣為傳揚。如前所述，宇都宮初次會見張之洞當在 1897 年 12 月 31 日，康有為其時正在北京，能否及時得到消息？其次，附片專門提議派員赴日進行秘密外交，而這正是張之洞的想法。這一摺一片給人的感覺，完全像是為張之洞服務的。王鵬運當時固然常為康有為代上奏摺，但與張之洞一系也走得比較近。1898 年初，張之洞之侄張彬(1869-?)曾向乃叔寫信報告京中情形，內稱：「嶠(引者按：張之洞門生楊銳，1857-1898)並言，幼霞(引者按：王鵬運字)近來頗得力，伊之為人，與高理翁(引者按：御史高燮曾，1841-1917)有別，非心照不可」。<sup>107</sup>楊銳是張之洞的心腹，他對王鵬運有所褒揚。「頗得力」的用語值得玩味，這似乎說明，王鵬運為張之洞出過力。因此筆者以為，這一摺一片可能為張之洞所授意。

而在同時，張之洞對英國的態度愈發敵視。1 月 14 日電奏，對英商要求承造粵漢鐵路表示警惕，請求由紳商自辦。<sup>108</sup>隨後，又因為竇納樂 1 月 15 日向總署要求借用英款，附以大量政治與商務條件，張之洞大感不可，1 月 16 日三次電奏。其中也有若干「聯英」的建議，但主旨是以此抵制英國可能的「大舉」。另外，他也針對前述 1 月 4 日電旨為自己作了委婉的辯護，聲稱「所謂聯者，不過設法羈縻，免多樹敵耳」。在此又可看出他對英日兩國態度的區別：一方面表示「所謂藉聯倭以聯英者，恐英要求太橫，可托倭居間婉商，減其貪欲兇焰」，一方面則說「倭實有唇齒之憂，深恐中危西強，彼必不保，情詞惶急」。<sup>109</sup>稍後，張之洞又連連發電與王文韶、盛宣懷、陳寶箴、劉坤一等人商議，其中甚至有「(英國)欲乘此一舉吞滅中國」之語。<sup>110</sup>

<sup>106</sup> 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頁128-129；茅海建，〈康有為與「真奏議」——讀孔祥吉編著《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近代史研究》，第3期(2009.06)，頁145-146。

<sup>107</sup> 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的京中密信〉，《中華文史論叢》，第3期(上海，2011.09)，頁52、57-58。

<sup>108</sup> 〈致總署〉(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申刻發)，《張之洞全集》第4冊，頁463。

<sup>109</sup> 〈致總署〉(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未刻發、酉刻發)，《張之洞全集》第4冊，頁463-465。

<sup>110</sup> 參見張之洞致王文韶、盛宣懷、陳寶箴、劉坤一諸電，《張之洞全集》第9冊，頁281-284。

1月21日，總署對張之洞1月2、16日的六份電奏作了回覆。此電對16日電中抵制英國的主張未作評論，基本還是針對結聯英日一事表態，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三點：一、英日兩國結聯中國，只是為了對抗俄國：「俄焰日熾，各國畏忌，日、英尤切，其欲聯我，無非藉我為遮罩，無資於我也。」；二、聯盟英日則會得罪俄德法三國：「既與聯則必有密約，日、英政出議院，斷難久秘，一經傳播，中俄之交絕，德、法乘之，其禍不可思議。」；三、說英日有意聯中，沒有可靠證據：「日英求聯，皆游士兵官之言，該使從不稍露端倪。聯之一字，甚不易言。」<sup>111</sup>此後，張之洞不再上奏提議聯英或聯日。對英國，他的態度徹底冷了下去。至於對日本，他不再向朝廷或總署表示自己的態度，而開始與神尾、宇都宮等人籌劃留學、練兵等事。湖北率先走上了與日本合作的道路。

當然，除張之洞與劉坤一之外，當時的士大夫(特別是維新派人士)中間也不乏聯日的聲音。典型人物如康有為，從1897年底開始屢有此種鼓吹。<sup>112</sup>需要注意的是，這些人群的聯日思想在外因上可能主要來自與日本民間人士的交往，但日本軍方的作用也不可忽視。譬如，神尾、梶川與宇都宮來鄂時曾向譚嗣同(1865-1898)宣揚中日「唇齒相依」、「本兄弟國」，促使譚與密友唐才常(1867-1900)傾向聯日。<sup>113</sup>

## 六、「川上模式」在其他地區的展開

應當指出的是，神尾、宇都宮訪鄂並不是孤立的個案，可以說反映了當時日本(尤其是參謀本部)對華外交的一種典型模式。鑒於川上操六對這種模式的主導作用，筆者姑且稱之為「川上模式」。在此稍作展開論述。

首先，宇都宮1899年5月又前往福州拜訪閩浙總督許應騷(1832-1903)，其行動模式與前次赴鄂頗為類似。此行的背景，應當與日本在福建的擴張有

<sup>111</sup> 〈總署來電〉(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張之洞全集》第4冊，頁465。

<sup>112</sup>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頁254。

<sup>113</sup> 譚嗣同，〈論中國情形危急〉，收入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98；唐才常，〈論中國宜與英日聯盟〉，收入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151-152。

關。自從吞併臺灣之後，日本一直將臺灣對岸的福建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1898年4月4日令清政府聲明福建不割讓給他國，次年4月28日又在福州取得專管居留地。與遊說張之洞時相仿，宇都宮會見許應駘時首先大談中日聯手對抗列強的必要性，然後勸說「與日本有至緊至要關係之福建省應有相當之整備」，其具體內容包括派遣官員赴日考察、派出留日學生、聘用日本軍官翻譯書籍。結果，許應駘完全接受了這些要求。<sup>114</sup>當年夏天，許應駘派福勝後營營官、候選直隸州知州崔祥奎(1858-?日後官至第十九鎮統制)等7人觀摩日本陸軍演習，是為福建官方第一次赴日考察。許應駘同時亦派出第一批8名留學生，其中包括後來在民國軍界、外交界身居高位的許崇智(1886-1965)、劉崇傑(1880-1956)。<sup>115</sup>

事實上，宇都宮此行不只為了遊說，還考察了福州的軍事要地。在當時寄送給福島安正的報告中，他策劃了一份詳細的行動方案，計畫出動一個步兵聯隊以及若干配屬部隊，占領福州外港羅源灣。這與日本陸軍檔案所存《對於福建省之計畫案》、《對福建攻勢計畫第一草案》兩個同年擬定的計畫應有關聯，也可以視為次年廈門事件中日本出兵的先聲。<sup>116</sup>可見，日本軍方在對華「懷柔」的表象背後也在進行武力擴張的準備。

而在前引川上傳記提及的四名來華推進「日清提攜」政策的軍官中，除神尾、宇都宮之外還有青木宣純(1859-1924)、<sup>117</sup>井戶川辰三(1870-1943)兩人。<sup>118</sup>先說後者。井戶川當時為參謀本部大尉附員，1898年6月28日奉命

<sup>114</sup> 〈極密報告扣(臨報第1-5號)〉，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藏，《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書類》，檔號160。

<sup>115</sup>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大日記》，檔號JACAR Ref. C04013642100，「明治32年『壹大日記』」；朱發建校點，《沈翊清東遊日記》(長沙：嶽麓書社，2016)，頁9-10。

<sup>116</sup>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一般史料》，檔號JACAR Ref. C13032437800，「參考資料」。

<sup>117</sup> 青木宣純，佐土原藩出身，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舊第三期，歷任陸軍士官學校教官、參謀本部第二局員、野戰炮兵第十四聯隊長、旅順要塞司令官等職，曾經四度出任駐華公使館武官，並長期擔任袁世凱、黎元洪的軍事顧問，官至陸軍中將。參見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頁5；《對支回顧錄》，下卷，頁317-323。

<sup>118</sup> 井戶川辰三，宮崎縣出身，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歷任參謀本部附員、陸軍大臣秘書官、步兵第六十二聯隊長、近衛步兵第三聯隊長、步兵第三十九旅團長、第十三師團長等職，官至陸軍中將。參見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頁

赴華。<sup>119</sup>他原本在重慶活動，次年又赴成都會見新任四川總督奎俊。正如神尾、宇都宮促成張之洞、許應騷派員赴日考察一樣，井戶川首先取得的成果也是說動奎俊派出赴日考察團。據井戶川的陸軍士官學校同期同學、當時因預備考察西藏而入川的著名探險家成田安輝(1864-1915)記載，「井戶川大尉至成都，焦心苦慮談判之結果，遂決留學生派遣之事，先選送視察員。」<sup>120</sup>在井戶川的鼓動下，奎俊派候補道沈翊清(1861-1908)、記名提督丁鴻臣(1845-1904)赴日考察。<sup>121</sup>當時的一位隨行成員，後來在四川官場頗有名氣的周善培(1875-1958)，曾任四川通省勸業道晚年回憶，他先後到過日本七次，「第一次是日本參謀本部派遣大尉井戶川辰三來川訪問四川總督奎俊，首先說，明治天皇對甲午之役甚為抱歉，勸四川派人赴日本參觀，並派留學生赴日本」。<sup>122</sup>所謂「甚為抱歉」，正與神尾的「彼此俱誤」說辭相似。1901年四川派出首批留日學生，源頭正是井戶川的鼓動。同時，井戶川還勸奎俊聘用日本人擔任四川武備學堂教習。<sup>123</sup>

井戶川在四川一直待到1901年，幾年間向日本發送了不少政治情報。其中1899年4月5日的一篇報告比較值得注意。在「該地(引者按：即重慶)對日本之人心」的標題下，他寫道：

該地對日本之人心原本不惡。去年以來張氏、劉氏(引者按：即張之洞、劉坤一)與我國之關係，及北京政變後對康梁等之處置，一時靡動世上，令日本刻記於人心之中。唇齒輔車之說於志士間囂囂然，學生之望留學者更多，或欲至湖北，先入張氏之門，以遂其志，或欲自費試

13；東亞同文會編，《統對支回顧錄》(東京：原書房，1973)，下卷，頁445-453。

<sup>119</sup>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大日記》，檔號JACAR Ref. C10070982900，「明治31年6月より32年12月に至る 発着控第1号」。

<sup>120</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3050316800(畫面3)，「成田安輝西藏探險關係一件」。

<sup>121</sup>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4419、443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7090025600(畫面78-80)，「清國兵制改革一件(清國ニ於テ帝國武官招聘ニ關スル件)第一卷」。

<sup>122</sup> 周善培，〈正確對待外國教師和專家——與日人交往的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輯24(1981)，頁24。

<sup>123</sup> 奎俊片，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檔號143204。

之。下官閒暇時授學生以日本語，未久即達二十餘名。是乃受湖北派遣留學生之影響，自不待論；然亦可知少壯青年之意向也。此等少壯青年，前途實堪屬望也。又，據聞總督於此次法國對余賊事件(引者按：即余棟臣反洋教起事)之要求，欲求助於日英。<sup>124</sup>

井戶川指出，劉坤一、張之洞自上年以來的親日態度影響了重慶人士對日本的觀感。在地緣上，張之洞對這裡的作用無疑更為顯著。某些青年受到上年年底他首次派遣留日學生的推動，打算前去湖北報考官費留學或自費留學。井戶川通過教授日語，向這些「少壯青年」施加影響，其中最著名的一人便是「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1885-1905)。<sup>125</sup>

再說青木。他於甲午戰前曾在廣東、北京從事情報活動三年，兼通官話和粵語，戰後接替神尾擔任駐華公使館武官。1900年初被山東巡撫袁世凱(1859-1916)聘為顧問，但因庚子事變很快爆發，旋即加入日軍「臨時派遣隊」，實際上沒有為袁服務，事變後曾任天津都統衙門三人委員會成員和「清國駐屯軍」參謀長。<sup>126</sup>戶部良一先生敏銳地指出了其職業生涯的特質：「青木的職業經歷是以公使館武官為起點，且一直在派遣地任職，與陸軍中央的要職無緣。」<sup>127</sup>比起回國後完全脫離情報工作的神尾，以及不常在第一線活動的宇都宮，他才是徹頭徹尾的中國通軍人。

庚子事變平息後，袁世凱於1902年初聘請當時在「清國駐屯軍」司令部任職的參謀本部附員立花小一郎(1861-1929)少佐為顧問。接下來又與青木商議，打算聘請步、騎、炮、工、輜各兵種的日本軍官各一人。<sup>128</sup>於是，在

<sup>124</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7090483500(畫面78-79)，「在外武官報告 第二卷」。

<sup>125</sup> 黃季陸主編，《革命人物志》(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1)第6冊，頁330-331。

<sup>126</sup> 孫立民等譯，〈青木宣純與坂西利八郎〉，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30(1985)，頁163-168；戶部良一著，諏訪一幸等譯，《日本陸軍與中國：「支那通」折射的夢想和挫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40-41。

<sup>127</sup> 戶部良一，《日本陸軍與中國：「支那通」折射的夢想和挫折》，頁58。

<sup>128</sup>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大日記》，檔號JACAR Ref. C06083668700，「明治35年坤『貳大日記3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7090025700(畫面95)、B07090025800(畫面13-14)，「清国兵制改革一件(清国二於于帝国武官招聘二関スル件)第一卷」。

青木開闢道路之後，自立花開始，日本軍官源源不斷地湧入袁世凱的直隸總督幕府。其中，立花的後任坂西利八郎(1871-1950)少佐更是前後在華二十餘年的資深中國通，對清末民初的中日關係影響甚大。<sup>129</sup>同時，袁世凱也開始對日派遣軍事留學生，首批 55 人於 1902 年 3 月 20 日出發。<sup>130</sup>

在此應當指出的是，在甲午戰後至日俄戰前，俄國一直將中國北方邊疆(包括直隸)視為勢力範圍，尤其嚴防其他列強插手這裡的軍事改革。因此，日本軍人在這裡立足很不容易。譬如，1902 年初聽聞袁世凱將聘用日本教習訓練北洋新軍後，俄國駐華公使雷薩爾(Паве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ессар, 1851-1905)馬上向清政府提出抗議。<sup>131</sup>為此，中日雙方煞費苦心採取了一些掩護措施。坂西日後回憶：「當時李鴻章和俄國訂立了秘密條約(引者按：應指《中俄密約》，但其中並未規定下文提及的教官一事)，其中規定如果中國軍隊僱用教官，必須先僱用俄國人。這也是日俄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日本軍人表面上不能在中國軍隊內當教官，所以當時不叫教官，也不叫顧問，而是用中國人給定的『兵書翻譯官』的名義。」為了避免引人注目，坂西等人平日都是一副中式裝束，甚至留起了辮子。<sup>132</sup>這是南方所不存在的現象。

在青木之前，日方已對北方大員做過若干工作。據駐牛莊領事田邊熊三郎(1865-1926)1898 年 9 月 21 日給小村的報告，此前參謀本部的倉辻少佐曾邀約四川提督、毅軍總統宋慶(1820-1902，其時率部駐守營口)派員參觀當年秋季的陸軍大演習，此時又托田邊再度作邀，同時亦邀盛京將軍依克唐阿(1833-1899)。<sup>133</sup>倉辻少佐，即參謀本部部員、工兵少佐倉辻明俊(1854-1917)。他於當年 5 月 27 日向參謀本部申領護照，準備來華，同行者有步兵大尉伊

<sup>129</sup> 關於袁世凱當時聘請日本軍人的概況，可參見山根幸夫，〈袁世凱と日本人たち—坂西利八郎を中心として—〉，《社会科学討究》，第30期第3卷(東京，1985.04)，頁52-54、56-59。

<sup>130</sup> 〈遣派武備學生赴日片〉(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來新夏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1冊，頁754-755。

<sup>131</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7090025700(畫面91-93、98-101)，「清国兵制改革一件(清国ニ於テ帝国武官招聘ニ関スル件)第一卷」。

<sup>132</sup> 孫立民等譯，〈青木宣純與坂西利八郎〉，頁178。

<sup>133</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7090025500(畫面21-23)，「清国兵制改革一件(清国ニ於テ帝国武官招聘ニ関スル件)第一卷」。

豆凡夫(1864-1944)與兩名陸地測量手。<sup>134</sup>由此觀之，他來華的目的似乎是測繪，並非如神尾等人一般專為遊說。而在測繪之餘不忘遊說，更可見「川上模式」運用之頻繁。

倉辻與宋慶的會談未見記載，但根據田邊的報告，他遊說宋慶的手法與「川上模式」並無二致：聲稱日方邀請參觀演習，是為了引導清軍的改良，以便「共維東洋之和平」，並希望由此推進派遣留日學生，乃至聘用日本軍官。宋慶雖然以生病未癒、已上奏乞假為由婉拒派員參觀一事，但對於這些說辭，據稱聽時頻頻頷首，還表示「俄人跳樑，東三省若無貴國人之助力，終難保有」，令田邊感到「真情流露」。此外，宋慶還一口答應修書勸告依克唐阿派員參觀演習。<sup>135</sup>

總體觀之，「川上模式」大約可以歸納為如下內容：由參謀本部的中下級軍官向清朝地方大員進行遊說，中心思想為共同抵禦列強的亞洲主義論調，具體措施則為建議赴日考察、參觀演習、派遣留學、聘請日人等。川上本人雖然於1899年5月11日早逝，但他的這些佈局對中日關係的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

## 七、結語

膠州灣事件發生後，外務大臣西德二郎對此採取的外交方針非常保守，負責對華外交實務的駐華公使矢野文雄也表現平平。有所作為的，反而是理論上沒有外交權責的兩個部門——駐上海領事館和參謀本部。代理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自就任以來一直熱心結交清朝士大夫，膠案之後與上海道蔡鈞一同策劃了中英日同盟的計畫，並由蔡鈞傳達給劉坤一、張之洞兩名疆臣。同時，參謀次長川上操六陸續派遣神尾光臣、宇都宮太郎來華遊說。

<sup>134</sup>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大日記》，檔號JACAR Ref. C06082990200，「明治31年坤『貳大日記5月』」。

<sup>135</sup>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7090025500(畫面21-23、26-27)，「清国兵制改革一件(清国ニ於テ帝国武官招聘ニ関スル件)第一卷」。對日方的邀請，依克唐阿答以忙於迎接玉牒(玉牒即宗室譜牒，每次纂修之後須送至盛京)，無暇顧及。田邊揣測，真實恐怕是因為戊戌政變後時局大變。

恰在此時，沈敦和也傳遞了「英將」關於聯交的言論。在種種合力作用下，劉、張二人都傾向結聯英日，前者向總署表達此意，後者態度更加積極，率先上奏。儘管中樞對此不表贊同，但親日的種子已經在一批清朝官員心中播下，並很快生根發芽，蔓延開來。張之洞更開始自行與日方策劃留學、練兵等合作事宜。在參謀本部的繼續推動下，「川上模式」亦在福建、四川、直隸、奉天等地展開。至於英國，由於此時並沒有對華結好的計畫，一廂情願的聯英主張很快消失。

日本對華外交至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的是小田切、川上、神尾、宇都宮等人。其外交主體的多元性，在這裡鮮明地體現出來。「局部的外交官」小田切在駐華公使—總理衙門的常規外交管道外另闢蹊徑，通過蔡鈞影響了劉、張的決策。駐華領事的特殊性，當時已被一些日本人所認知。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在 1899 年來華遊歷後寫成的遊記中提出，「在中國的領事官實際需要外交官的資格和手腕」。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清朝疆吏權重的特性：「清國的政治上，實際的權力被分給各個封疆大吏，有關地方的交涉事務，和地方大員商量要比和總理衙門交涉便捷。」二是鑒於列強競爭的激烈：「各國競爭，以先占者為勝，無遑等待把事情交給北京公使館，再由北京公使館和總理衙門交涉，再由總理衙門照會各省督撫徵求意見的曲折過程，而是採取先與地方大員交涉，確認自己的要求能否通過這麼一個便捷的方法。」<sup>136</sup>

另一方面，對華外交不同於對歐美外交，是日本「大陸政策」的一部分。作為大陸政策的主要推動者，陸軍擁有自己的政策體系和政策理念。<sup>137</sup>它有意願、也有能力在外務省之外開闢另一條對華外交管道。當然，若以標準的定義衡量，陸軍的「三宅坂外交」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外交。但在對華事務當中，它的作用絕不亞於外務省的「霞關外交」。如戶部良一先生所論：「在戰前的日本，最廣泛也是最有組織地搜集中國的有關情報、並且以其在情報的質和量上都具有壓倒性優勢而自傲的，當屬陸軍。就連主張外交一元化並且

<sup>136</sup> 內藤湖南著，吳衛峰譯，《燕山楚水》(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94-198。

<sup>137</sup>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1906-191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頁1-2。

討厭軍方參與對中關係的外務省，在情報搜集方面也比不上陸軍「大陸政策」。在針對中國的情報方面，陸軍因為與外務省相比有絕對的自信，所以才經常放任去做被稱為『二重外交』的外交介入。」<sup>138</sup>作為陸軍軍令機關參謀本部的實際掌門人，川上主導了此時陸軍的對華外交，而他手下也有一批精幹的人才。此後「大陸政策」的實施中，神尾這樣的中國通越來越多，對中國政治的參與也越來越深。

作為小田切、神尾等人的交涉對象，劉坤一、張之洞、蔡鈞等人的外交水準卻極為低下。他們對當時的國際局勢和外交規則缺乏足夠的認識，每每輕易為日方的言辭所動。尤其是張之洞，他一方面抱持強烈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容易被人利用；另一方面又有一股書生意氣，行事輕率而執拗。他自以為是在匡扶大局，殊不知已經成為日本人手中的棋子。這種情形，可以說是日方「軟權力」的一次完美施展：「一個國家使得其他國家以其預期目標為目標。」<sup>139</sup>

---

<sup>138</sup> 戶部良一，《日本陸軍與中國：「支那通」折射的夢想和挫折》，頁6。

<sup>139</sup> 約瑟夫著，門洪華譯，《硬權力與軟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06。

## 徵引書目

### *Bibliography*

#### (一) 檔案史料

##### 1.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

《張之洞電稿》，無檔號。

#####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張之洞電稿乙編》，函11第2冊，檔號甲182-72。

##### 3.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奎俊片，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軍機處檔》，檔號143204。

##### 4. 上海圖書館藏

〈膠事函電抄存〉，《盛宣懷檔案》，檔號037658。

##### 5.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3041173300，「独国ノ膠州湾租借關係一件 第一卷」。

《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13080200000，「機密雜件 第1卷」。

《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7090025500-B07090025800，「清国兵制改革一件(清国ニ於テ帝国武官招聘ニ関スル件)第一卷」。

《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3050316800，「成田安輝西藏探検關係一件」。

《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檔號JACAR Ref. B07090483500，「在外武官報告 第二卷」。

## 6.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 《海軍省公文備考》，檔號JACAR Ref. C06091099100，「明治30年 公文備考 演習艦船1卷4」。
- 《海軍省公文備考》，檔號JACAR Ref. C10126109500，「明治30年 公文雜輯 卷7 艦船1」。
- 《海軍省公文備考》，檔號JACAR Ref. C06091186700，「明治31年 公文備考 外人建白請願外交及請願上 卷23」。
- 《海軍省公文備考》，檔號JACAR Ref. C06091152800，「明治31年 公文備考 艦船2卷5」。
- 《陸軍省大日記》，檔號JACAR Ref. C07082241500、C07082241800，「明治31年 參謀本部大日記 參月」。
- 《陸軍省大日記》，檔號JACAR Ref. C06082990200，「明治31年坤『貳大日記5月』」。
- 《陸軍省大日記》，檔號JACAR Ref. C10070982900，「明治31年6月より32年12月に至る 発着控第1号」。
- 《陸軍省大日記》，檔號JACAR Ref. C04013642100，「明治32年『壹大日記』」。
- 《陸軍省大日記》，檔號JACAR Ref. C06083668700，「明治35年坤『貳大日記3月』」。
- 《陸軍一般史料》，檔號JACAR Ref. C13032437800，「參考資料」。

## 7.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藏

- 〈臨時報告第2號(控)-第8號〉，《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書類》，檔號148。
- 〈極密報告扣(臨報第1-5號)〉，《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書類》，檔號160。

## 二、其他史料

- 青島市博物館等編，《德國侵占膠州灣史料選編 1897-1898》，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
- 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2。
- 黃福慶主編，《膠澳專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
- 來新夏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上海：中西書局，2012。
-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
-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徐世昌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明光整理，〈《橫山鄉人日記》選摘〉，《近代史資料》，號76(1989)。
- 王金科選輯，〈張之洞電稿(二)〉，《文物春秋》，1990年第2期。
- 陳旭麓等主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義和團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王爾敏、吳倫霓霞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 北京大學歷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懷未刊信稿》，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
-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朱發建校點，《沈翊清東遊日記》，長沙：嶽麓書社，2016。
- 周善培，〈正確對待外國教師和專家——與日人交往的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輯24(1981)。
- 孫立民等譯，〈青木宣純與坂西利八郎〉，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30(1985)。
- 內藤湖南著，吳衛峰譯，《燕山楚水》，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30-31冊，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4。
- 小栗又一，《竜溪矢野文雄君伝》，著者自印，1930。
- 林權助，《わが七十年を語る》，東京：第一書房，1935。
- 佚名(植原陳政)，《清國政況視察復命書》，鉛印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イ14 A0892。
- 対支功勞者伝記編纂會編，《対支回顧録》，東京：原書房，1968。
- 東亜同文會編，《統対支回顧録》，東京：原書房，1973。
- 富猪一郎，《陸軍大將川上操六》，東京：第一公論社，1942。
- 懷德堂記念會編，《碩園先生遺集》，大阪：懷德堂記念會，1936。
- 岡幸七郎，〈天囚博士と張之洞〉，收入宮里立士、佐藤哲彦編集，《大阪出版文

- 化資料集》，第1卷《碩園先生追悼錄》，東京：ゆまに書房，2012。
- 大里浩秋整理，〈宗方小太郎日記 明治30~31年〉，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報》，40(横浜，2010.03)。
- “Passengers,” ; “Shanghai Shipping Intelligence,” *North-China Herald*, 7 February 1898, 202; 213.

### 三、專著

-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
- 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 馬衛中、董俊珏，《陳三立年譜》，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
- 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 黃季陸主編，《革命人物志》，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1。
- 任達著，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 菲利浦·約瑟夫著，胡濱譯，《列強對華外交(1894-1900)——對華政治經濟關係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 托馬斯·奧特著，李陽譯，《中國問題：1894-1905年的大國角逐與英國的孤立政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 戶部良一著，諏訪一幸等譯，《日本陸軍與中國：「支那通」折射的夢想和挫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 約瑟夫·S·奈著，門洪華譯，《硬權力與軟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外務省編，《小村外交史》，東京：新聞月鑑社，1953。
- 藤谷浩悅，《戊戌政變の衝擊と日本—日中聯盟論の模索と展開—》，東京：研文出版，2015。
- 千葉功，《旧外交の形成——日本外交1900-1919》，東京：勁草書房，2008。
-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1906-191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
- 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

### 四、論文

- 茅海建、鄭匡民，〈日本政府對於戊戌變法的觀察與反應〉，《歷史研究》，3(北

- 京，2004.06），頁54-109。
- 茅海建，〈張之洞與陳寶箴及湖南維新運動〉，《中華文史論叢》，第3期(上海，2011.09)，頁221-311。
- 茅海建，〈康有為與「真奏議」——讀孔祥吉編著《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2009.06)，頁142-158。
- 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的京中密信〉，《中華文史論叢》，第3期(上海，2010.09)，頁1-64。
- 伊原澤周，〈張之洞的聯日制俄政策與日本〉，收入苑書義、秦進才主編，《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44-160。
- 陶德民，〈戊戌變法前夜日本參謀本部的張之洞工作〉，收入王曉秋主編，《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403-420。
-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戊戌維新前後的康、梁、張之洞與日本〉，收入孔祥吉、村田雄二郎著，《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係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頁76-122。
- 桑兵，〈「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2006.06)，頁41-53。
- 邱濤、鄭匡民，〈戊戌政變前的日中結盟活動〉，《近代史研究》，第1期(北京，2010.02)，頁40-53。
- 戴海斌，〈義和團事變中的日本在華外交官——以駐上海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為例〉，《抗日戰爭研究》，第3期(北京，2012.06)，頁48-62。
- 王世宗，〈「新帝國主義」中的逆流：莎士保理與英國的遠東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臺北，1996)，頁91-132。
- 于乃明，〈小田切萬壽之助研究——明治大正期中日關係史の一側面〉，筑波大學社會研究科博士論文，1998，頁1-614。
- 廖隆幹，〈戊戌變法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対清外交〉，《日本歴史》，第471期(東京，1987.08)，頁68-84。
- 李廷江，〈日本軍事顧問と張之洞—1898-1907〉，《アジア研究所紀要》，第29期(東京，2002.03)，頁1-24。
- 齋藤聖二，〈明治期の宇都宮太郎—駐英武官・連隊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收入宇都宮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東京：岩波書店，2007，第1卷，頁1-44。
- 山根幸夫，〈袁世凱と日本人たち—坂西利八郎を中心として〉，《社会科学討究》，第30期第3卷(東京，1985.04)，頁49-67。

## **The Shif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the Jiaozhou Bay Incident: With a Study on the Pluralism of the Japanese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Ji, C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uhai), Sun Yat-sen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After the Jiaozhou Bay Incident of 1897, Japa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mulated a very conservative diplomatic strategy to persuade the Qing government to compromise with Germany. In practice, the performance of Yano Fumio, the Minister to China, was not impressive. Hence, Odagiri Masunosuke, the acting Consul General in Shanghai,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persuade Cai Jun, the Circuit Intendant of Shanghai, to put forward a proposal for an alliance between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to Liu Kunyi and Zhang Zhidong, the Viceroy of Liangjiang and Huguang respectively. A similar proposal was also raised by a British naval officer. At the same time, Kawakami Soroku, the vice director of the Japanese General Staff sent his subordinates Kamio Mitsuomi and Utsunomiya Tarō to China for lobbying Chinese officials.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all these events, Liu Kunyi proposed the Zongli Yamen to ally with Britain and Japan, and Zhang Zhidong took the lead in presenting the idea to the Emperor. Althoug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d not agree with this proposal, pro-Japan seeds were planted in the mind of a number of Chinese officials,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reafter. Because Britain had no plan to ally with China, the idea of allying with Britain disappeared soon. This mode of sending middle and junior officers for lobbying Chinese high-rank regional officials was also carried out in some other provinces such as Fujian, Sichuan, Zhili, and Fengtian. In this aspect, Japan's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ha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among which the key role was not play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r the Minister to China, but by the Consul General in Shanghai and the General Staff, which theoretically have no diplomatic responsibilities. This reveals the pluralism of Japanese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Keywords: Jiaozhou Bay Inciden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Japanese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Zhang Zhidong**

